

主编 苏天钧



北京考古集成

5

侯仁之题



北京出版社

北京考古集成

宋
辽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北京地区辽金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齐 心(1)
北京地区辽代砖室墓形制研究	苏天钧(4)
北京地区辽代砖室墓形制研究(续)	苏天钧(29)
辽南京火葬习俗浅议	沈 平(40)
首博馆藏辽代银面具的文化功能试析	李 琦(44)
辽燕京佛教及其相关文化考论	齐 心 王 玲(47)
辽燕京佛寺考	郑恩淮(59)
北京大兴县出土陶水木偶的脱水技术报告	胡一红(68)
宋《新铸铜人膂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	于 柯(72)
宋《新铸铜人膂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再次发现及其整体复原初探	吴元真(78)
门头沟考古二则	包世轩(82)
路振、王曾所记之燕京城	贾敬颜(91)
辽金古迹高度集中的阳台山和凤凰岭	张宝贵(96)
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	赵其昌(97)
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二)	孙繁云(100)
北京辽墓初探	刘耀辉(104)
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	苏天钧(107)
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	苏天钧(112)
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	苏天钧(121)
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23)
北京先农坛辽墓	马希桂(131)
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	鲁 琪 赵福生(133)
辽墓壁画	鲁 琪(138)
北京辽墓壁画揭取保护初探	胡一红(140)
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	张先得(142)
辽韩佚墓发掘报告	黄秀纯 傅公敏(149)
辽代韩佚墓	黄秀纯(173)
北京顺义安辛庄辽墓发掘简报	王武钰 祁庆国(174)
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清理简报	周景城 王殿华 邢 军(181)
海淀区羊坊店辽墓	刘達成 李 达(190)
顺义县辽代砖室墓	祁庆国 王武钰(191)
丰台区永定路发现辽墓	王有泉(192)

门头沟新桥街辽墓	刘义全(193)
董氏三志考	齐心(194)
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	鲁琪(199)
辽代张俭墓志考	黄秀纯(202)
辽张俭墓地辩证	黄秀纯(207)
北京出土辽张嗣甫墓志考	齐心(210)
后唐北平王赵德钧	苏天钧(214)
辽丁氏两方墓志考	齐心(220)
辽代南京留守秦王萧孝穆画像碑考	齐心(225)
记辽代石刻秦王发愿纪事碑	陈育丞(230)
《秦王发愿纪事碑考》商榷	阎万章(232)
辽应历五年石幢题记初探	刘精义 齐心(235)
解读石景山上一方摩崖刻石	关绪文(238)
辽景宗石像及鼎形供座	周良(239)
延庆洞沟古崖居遗址	王策 李达(240)
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	鲁琪(241)
龙泉务窑窑具及装烧工艺	黄秀纯(248)
北京龙泉务窑址简介	黄秀纯(253)
门头沟区龙泉务古瓷窑址	黄秀纯 齐鸿浩(255)
龙泉务古瓷窑址钻探小记	黄秀纯(256)
龙泉务窑址发掘获重大成果	(257)
北京市龙泉务古瓷窑遗址	刘义全(258)
山后八军瓷窑非北京龙泉务窑辨	冯永谦(259)
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简述	马希桂(260)
略论龙泉务窑址归属问题	黄秀纯 刘义全 齐鸿浩(266)
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务窑关系初探	齐鸿浩 黄秀纯 刘义全(269)
从“寿昌五”纪年款三彩残片看龙泉务窑的烧制年代及性质	赵光林(273)
北京最早的陶瓷窑址	赵光林(274)
揭开北京出土辽瓷之谜——记北京龙泉务辽瓷窑发掘	齐鸿浩 黄秀纯(275)
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窑属问题的商榷	马希桂(276)
北京首次发现的越窑青瓷	黄秀纯(281)
密云县两处古代陶瓷窑址	赵光林(283)
略谈磁州窑	黄秀纯(284)
辽三彩菩萨像	齐鸿浩 安久亮(285)
辽黄绿釉鸡冠壶	赵光林(286)
宋官窑青釉弦纹大瓶	陈润民(287)
宋代钧窑玫瑰紫釉花盆	李纪贤(288)
宋墨竹纹虎枕	章津才(289)
北京房山县出土宋三彩枕	赵福生(290)
宋定窑孩儿枕	陈润民(291)
汝窑三足洗	陈润民(292)
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瓶	陈润民(293)
宋磁州窑白地黑花马术纹枕	陈润民(294)

宋钩窑镂空堆塑佛像供器·····	华义武(295)
近年北京地区发现的几处古代琉璃窑址·····	赵光林(296)
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300)
北京市房山县北郊村辽塔清理记·····	齐 心 刘精义(305)
北京天宁寺塔三题·····	王世仁(319)
通县出土罕见辽塔地宫石函·····	周 良 姚景民(335)
房山区辽代天开塔地宫出土珍贵文物·····	王武钰(336)
密云冶仙塔清理小记·····	市文研所密云县文管所(337)
房山坨里花塔原状探讨·····	梁玉贵(338)
新发现的辽应历五年经幢题记考释·····	刘精义 齐 心(343)
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	林元白(347)
辽玉河县清水院经幢考·····	包世轩(356)
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经幢考·····	包世轩(362)
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经幢考(续)·····	包世轩(366)
千佛塔露盘题记考·····	向 南(370)
辽代白塔寺史迹考·····	黄春和(372)
庆寿寺·····	赵兴华(376)
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考·····	齐 心(377)
门头沟辽代伎乐经幢·····	齐鸿浩(380)
门头沟发现五座辽代经幢·····	包世轩(381)
辽代伎乐石经幢考·····	齐鸿浩(382)
澶渊之盟与房山石经·····	杨亦武(384)
房山石经与云居寺·····	杨亦武(387)
镇岗塔·····	赵程久(402)
北京地区发现辽金时代文物·····	苏天钧(403)
木偶戏图镜·····	傅大鹵(404)
罕见的二十八星宿铜镜·····	程瑞秀(406)
北京发现宋《满江红》词菱花铜镜·····	程长新(407)
“大蕃天显”纪年文字砖考·····	齐 心 刘精义(409)
介绍一方宋印·····	贾旭敏(412)
北京出土的辽、金时代铁器·····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413)
“天正”钱补证·····	杨鲁安(421)
宣武区出土的永安铁钱述论·····	张先得(423)
一组宋元时期的玉雕童子·····	张广文(425)
北京最早印刷品的发现及其雕造寺庙考略·····	郑思淮(431)
北京市文物商店藏《西楼苏帖》·····	秦 公(438)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442)
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法书·····	舒 华(443)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	朱家潘(446)
宋缂丝金龙花卉首·····	李英华(447)

北京地区辽金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齐 心

北京地区的辽金考古工作在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一些重要的墓葬、遗址的发掘,和带有明确纪年的文物如墓志、石幢、石函等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北京地区辽金考古工作的空白,而且对探讨北京地区的辽金考古学的规律,以及对辽金时代幽燕地区的历史研究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当然我们做的工作还很不够,有的只限于零星发掘,没有为了解决某一个历史问题而进行有计划的重点发掘,所以材料还显得十分单薄、不够,也难以找出一个规律来,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也仅能概括地介绍一下情况。

考古工作的实践越来越证明:辽金考古学是辽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事辽金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之一。由于辽金史记载之疏漏,更需要地下出土的第一手材料印证,补充,因此为了把辽金史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不能不借助于田野考古的发现,客观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在北京城的发展史上,辽代(公元910~1125年)和金代(公元1115~1234年)是相当重要的历史时期,辽南京、金中都都是古老的蓟城从北方一个军事重镇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过渡时期。北京地处汉族和北方以及东北少数民族交往汇合的地方,是中原文化与北方地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枢纽。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处于契丹族、女真族政权统治下的幽燕地区,留下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遗迹、遗物。下面拟介绍辽金墓葬、塔墓、石函、石幢,以及辽金遗址、窑址、墓志等内容。

分析北京地区的辽代考古资料,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以下述25座辽墓为例,大多数为中

小型墓葬。不论时代早晚,其形制以平面呈圆形或长方形的单室为主流,八角形墓较少。北平王赵德钧与妻种氏合葬墓虽为前中后三进九室,但其基本形制是穹庐形,而且墓室仅有部分仿木结构,构筑不复杂。丁文道墓虽分前后两室,但平面仍为圆形。且与结构基本相同,说明燕云地区不同于契丹人起源活动的中心地带,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着汉族的礼俗制度。已发现清理的数十座辽墓,大部分被破坏、被盗过,绝大多数是小型砖室墓,土坑墓、石室墓较少。砖室墓中出现装饰性结构,如董库、丁文道墓砖雕仿木构建筑的假窗门、斗拱。王泽墓、董氏墓,以及彭庆辽墓影作桌、椅、假地窗等。一些墓中砌有砖棺床,或祭台。棺床上放置石棺或木棺(有的就是木质骨灰盒,也有的尸体或骨灰直接置于棺床上面)。25座辽墓里二分之一以上是火葬墓,六座葬式不明,其余为仰身直肢葬。其中一特殊现象是马直温墓的骨灰放置在关节能活动的大型木偶人的胸腹腔内。九座墓有墓志,约占2/5。墓志是确定该墓年代的重要依据。一半以上墓均绘有壁画,由于壁画所绘内容与风格不同,也是时代早晚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缩影。墓中一般均有少量随葬品。都是研究辽代历史的直接可靠的实物资料。

墓中随葬品有瓷、陶、铁、铜、墓志等。

瓷器 早期墓出土典型契丹风格的绿釉、黑釉鸡冠壶等,仿定的瓷器一般为碗、碟、盘、瓶之类,胎质较粗。晚期如王泽墓、马直温妻墓和塔墓中出土影青、定窑白瓷和青瓷制品,如白瓷注子、甬经壶、刻花盏托、盘、碗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品,是北京从外地输入的。早期赵德钧墓中官窑款定窑瓷器,也应是中原地区产品。尤其重要的是

1981年在韩佚墓中出土60余件瓷、陶、银、漆器中,其中五件青瓷,属南方越窑系,如划人物青瓷水注,划花荷叶形盏托,青瓷碗、碟、青瓷注碗,在北方墓葬中很少发现。这批瓷器胎薄而紧密,最薄胎厚仅2毫米,花纹精细,线条流畅,造型匀称协调。据文献记载:吴越国与契丹大辽政权早有来往,两国互派使节达十余次之多,每次必有供奉之物。因此韩佚墓中这批珍贵的青瓷,可能出自吴越的贡品。据墓中记载,韩佚是辽代崇文公韩延徽后代,韩延徽是辅佐契丹政权的崇臣,受到皇室的赏赐,以此随葬来宣耀自己的身份。

陶器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成组的明器,如锅、灶、炉、铛、壶等,而且有的陶器仅几厘米高,如同小孩玩具。

铁器 北京地区辽金遗址中普遍出土铁器,墓葬中也屡有发现,如铧、犁、耘耨等生产工具,六鬲锅、盆、熨斗、灯等生活用具。铁器的大批出现是辽代幽燕地区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标志。

钱币 这是墓中普遍随葬的,一般几十枚到百枚,多者甚至达千、万枚,如赵德钧墓随葬铜钱九万多枚,专辟钱库大部分是后宋钱,钱币背面铸地名二十余处,如京、津、洛、昌、桂等,说明长期以来幽燕地区与全国各地经济交往是十分广泛而频繁的。“金铜面具”的发现,揭示了契丹民族的葬俗。

辽政权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以汉族地主为辅,采取胡汉分治的政策,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治汉人,设南北面官。也就是在政治上采用“因俗而治”的办法,在幽燕地区网罗了大批汉族地主,实施统治。近几年来北京地区先后出土十余块墓志(绝大多数是圣宗以后的:圣宗1、兴宗5、道宗4、天祚帝1),墓志主人大部分是辽代幽燕地区的豪族大姓,如韩氏(韩资道,韩明道,韩佚)、张氏(张俭、张嗣甫与直温妻张氏等)、王师儒志,还有幽燕地区的财赋官,如丁文道父子,董氏父子等志均有出土。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补充辽史百官,食货、地理志之阙,而且也是契丹族统治政权结构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北京古地理的可靠材料。有的已发表,其他正在整理,不久即能发表,供学术界研究。

契丹统治者对于汉族的文化,不加排斥,而且积极地予以吸收。所以契丹人从官僚体制、礼俗制度、衣冠服饰,一直到文学艺术,汉化程度都非常高。这从壁画风格、内容窥见一斑。如赵德钧

墓的壁画;赵氏父子为降辽高官,但壁画却采用汉人的艺术风格,左中室一幅绘九人,左三人身着红袍,戴屈角幪头,正悠闲地观赏绘画,右六人是男女僮仆,三人梳髻,三人戴冠,其中一人持剑,右前室二幅壁画有梳高发髻、体态肥胖的女仆,一卷袖揉面,一托盘捧食,是墓主人悠闲寄生生活的写照,是一幅写实的历史画。其他小型墓的残壁画内容与风格,不论是宴饮、出行、花卉、鸟虫乃至生活场面,人物穿着打扮都不同程度地保持了汉民族的特征。高堂辽墓保存的彩画和山水画尤为罕见,墓室的侍女画和故事画中的人物皆为汉人,都穿汉衣。《辽史·仪卫志·舆服》载:“辽国自太宗入晋以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官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壁画中人物服冠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为辽代燕京地区衣冠制度提供了形象资料。都说明幽州的传统文化礼制在契丹族统治下仍然保持着,同时契丹人的风俗习惯在幽燕地区也影响着汉族人民,如墓中随葬的契丹族典型器物——鸡冠壶、马蹬壶等的发现,墓志中反映的婚姻制度,结婚不论辈份(见马直温妻张馆志,张馆是张俭的外孙女)。

燕京地区瓷器的烧造,辽代的盛行和佛塔的建造,都标志着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燕京集中了各种商人与手工工匠,随着宋辽之间交往的频繁,制瓷工艺也相继传播到这里,近几年北京地区发现三座古代瓷址。同时辽墓及塔墓出土大量的瓷器,绝大多数是仿宋定的白瓷器,约占全部出土瓷器的二分之一。主要是宋定窑烧造输入此地的,但其中也可能有燕京瓷窑龙泉窑烧造的。

辽代统治阶级崇信佛教。今天的北京土地上还耸立着一些辽塔,如天宁寺塔、眼山宝塔、昊天塔等,充分显示着当时的建筑艺术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

房山崇石经山的云居寺是一处古代的佛教圣地。1958年在云居寺南塔下发掘出一万多块辽金刻经。云居寺从隋到清,经历七个朝代,历时千余年,共刻造一万四千多块石经,装于九个洞,是十分宝贵的财富,是研究经济、文化及佛教历史的宝贵资料。仅举一例说明:1979年3月19日《人民日报》曾经报道,山西应县发现一批辽代卷轴佛经,佛经是当时燕京刻印的,经尾题记,注明刻印于“燕京杭州于显忠坊”时间是太平五年八月,即公元1025年8月。文献记载,辽代燕京城内共有

坊二十六个。但名字知道的仅三个，其余的坊名大部分是考证唐辽墓所得知的，而显忠坊既不见于文献记载，也未见于墓志，是从云居寺刻经上获知的。至于辽燕京城六条街的名字过去更是毫无所知。从刻经得知“杭州街”是当时六街之一。亦记载有关经济、水利等珍贵材料。

辽代崇佛之盛，也可从墓志记载中见到，王洋的继母、两个女儿先后落发为尼，其妻也“净信三归，坚全五戒”，王洋本人晚年，“杜门不出……看法华经三百部……”，董肇“灭罪真言”刻石的发现，以及辽天庆六年《刻《陀罗尼破地狱真言》和《佛顶心真言》的墓幢的发现都说明当时地主阶级以佛教为精神寄托，以此麻痹自己与欺骗人民。

北京地区金代考古材料也发现不少，如墓葬、遗址、墓志等。仅从前而例举的十五座较重要的金墓可见，大部分是土坑墓，少数为砖室墓，土坑中置后石椁、棺，石棺由六块带标印的石板组成，有的在石棺四角置河卵石一枚的习俗，大多数是火葬墓。值得注意的是女真人的墓占三分之一，这与辽代墓中无一座是契丹人的墓完全不同。最近几年来在房山东炼区曾发现建筑构件，如琉璃瓦当、栏板等，根据调查可能是一座大型金墓。据记载清代初年曾修葺过金太祖、太宗的坟墓，此处是金陵所在地，待今后进一步勘查和发掘。

金主完颜亮，于公元1153年（贞元之年）从东北会宁府迁都燕京，称燕京为中都，并在辽南京基础上，大兴土木。扩建的金中都城周约33里，是一座繁华富丽的大城市。金中都是北京辽都之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宋金媾和以后，中都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阶段，使当时的经济与文化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中都的工艺品生产获得很大成就。如1974年，在房山长沟峪金墓一口描金贴花的漆棺中，出土一批玉器，透雕双鹤衔草纹玉饰、透雕折枝花玉钗等都是罕见的珍品。1975年通县两座金代石棺墓中出土耀州窑单耳洗，定窑碗、盘、杯、瓶等，瓷质光滑、细腻，造型雅致，制作精美、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1978年在丰台区

卢沟桥公社，发现一枚“大金正隆二年银铤”。银铤正面刻铭“鄧州进奉正隆二年分，金吾卫上将军静难军节度使臣完颜宗坦进上，正旦银壹铤重伍拾两”。北京第一次发现金代银铤，是研究金中朝经济、和货币制度的宝贵资料。

中都作为女真族的统治中心，必然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一批女真人迁徙、定居中都，这从出土的金代墓志中也可得到印证。1978年在香山娘娘庙发现的金代蒲察胡沙墓志，志云：葬宛平县王阜之西北，附葬先茆之次”。这说明女真人蒲察氏的祖坟在香山一带，反映出长期定居中都的历史事实。北京地区发现的十合金代墓志、有1/2（五块）是女真贵族的。在门头沟区妙峰山发现金窝鲁欢（宗隽）墓与志，去年又发现乌古伦氏及其子元忠与妻鲁国大长公主墓志，据金史记载：“……蒲察、纥石烈、乌古伦”等姓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这些累世娶后尚主的有权势的女真贵族，其坟墓都在中都，是他们生前在中都为官的反映，是女真族占领幽燕地区后政治中心南移的直接反映。北京地区自石敬瑭割给契丹之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辽、金、元各朝的统治下，辽代统治北京近二百年，北京地区发现墓葬不算少（十七座墓），但都是汉人的，还没见契丹人在北京落户和修祖坟的情况。而出土的金代墓志与辽代比起来并不算多，但在这不多的墓志中居然有五合（1/2女真墓志，还有一盒石宗壁志，石虽然是汉人但其妻是女真人纥石烈氏，而且都是贵族高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至于墓志中记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职官、地理、食货、以及历史事件等材料，也很珍贵，是补充、纠正辽金史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总之，北京地区辽金时代的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与兄弟省市同行们的工作相比，差距太大，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限于材料与水平，尚难找出规律。一些新发现尚未及时发表，也致以歉意。今天我只能是抛砖引玉，敬祈专家、学者、同行们批评指教。

北京地区辽代砖室墓形制研究

苏天钧

四十多年来北京地区发掘了数十座辽代墓葬，其中砖室墓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砖室墓中无论是在形制、结构、葬俗、随葬品、壁画、墓志等方面都有较高研究价值。

契丹开国后不断向中原侵驻，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辽五都之一，居住在幽州地区的各族人民与契丹族共同进行生产，形成了一个混合文化体。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文化资料，现首先将北京地区辽代砖室墓形制进行分析和研究，分述如下：

一、墓葬形制

(一)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

1959年11月6日，北京南郊养鸭场发现了一座砖室墓。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派员前往调查时，了解到1956年曾于此墓南10米处发现过一方辽代墓志，为“辽故卢龙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北平王赠齐王天水赵公夫人故魏国夫人赠秦国夫人种氏合祔墓志铭”。根据这一线索，我们认为这座墓葬很重要，因此当时暂将暴露部分封埋保护。自1960年8月开始，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月的工作，才发掘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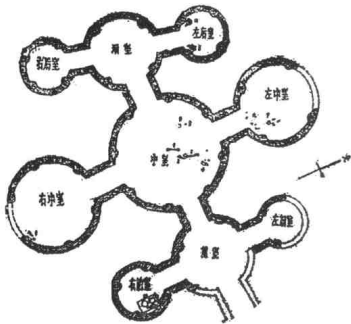
这座辽墓位于南郊西马场洋桥村养鸭场内，该村在永定门外海慧寺西1公里处，村北靠近凉水河南岸。这里可能是处在辽代京城外东南方^①。现将墓室结

构叙述如下。

墓室结构

墓葬东向，是一大型多室墓，全部用沟纹砖砌成，结构上部分是仿木建筑。墓砖一般都为长32、宽16、厚6厘米的长方形砖，也有每边长36厘米的方砖，但多作铺地用。此外，用来砌造斗拱、直根窗和门楣等处的砖是特制的，还有一些装饰用的雕砖。

此墓规模较大，分前、中、后三进，每进主室两侧又各筑一耳室，共九室(图一)。墓室间隔尺寸大致相近。九个墓室的平面皆为圆形，顶部都已残毁，根据残存的情况，推测墓顶原作覆盆式。北京一带发现的辽代圆形墓葬顶部均作覆盆式，可作



图一 墓室平面图(1/100)

参考。墓壁砖的砌法是二平一立。各室的柱头斗拱和补间斗拱形制都一样，仅有大小之分，枋斗下置一平砖，枋斗中间斗口夹一批竹昂式的耍头，左右各出一拱，拱上的二升因结构简化而省略了，上托柱头枋。基底铺砖，系用方砖交错平铺。

现将各室的结构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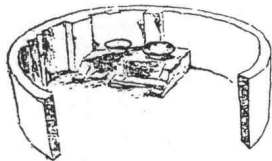
前室 直径2.74米。已残破不堪。周壁分立四柱。东侧大部破坏，墓葬正门及墓道已无存，倒塌的乱砖向东延续10米左右，这可能是因历代取土所破坏，也可能因距凉水河北岸仅20余米，故被洪水冲毁。北、南、西三侧各开一门，通往左前室、右前室和中室，墓壁上的彩绘及壁画全毁，仅在倒下的一些墙皮碎块上尚能看出彩绘的痕迹。

左前室 直径1.76米。已塌毁，保留下的墓壁残高不到0.5米。墓室南侧有门与前室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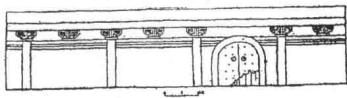
右前室 直径1.92米。周壁砌有四柱，斗拱部分保存较完整。北侧有门通往前室。东、西两侧各有壁画一幅，保存较好。东壁下设一炉灶，长0.66、宽0.44、高1.03米。灶上置有铁锅、石锅、玉碗和铜勺等物，推测此室为厨房（图二）。

中室 直径4.12米。为放置棺木的地方。墓壁上部已残，周壁砌有八柱。四侧各开一门，通往前室、后室、左中室和右中室。墓壁原有壁画四幅，但均已残毁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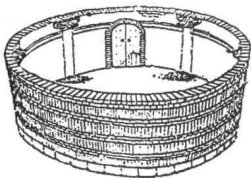
左中室 直径2.9米。北部已破坏，墓壁均坍塌，



图二 右前室素描示意图



图四 右后室墓壁展开示意图



图三 左后室素描示意图

塌，但由基底尚可见四柱痕迹。南侧有门通往中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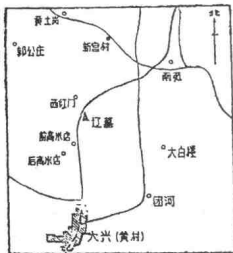
右中室 直径3.31米。保存比较完整，南壁上现存一缺口。周壁分砌六柱，柱头枋以下均未遭破坏，并砌有直棂窗。北侧有门通中室，木门尚存，门上保留有门钉钉痕及铺首遗迹。东西两侧均有壁画，西壁已残，东壁保存完整。

后室 直径2.62米。墓壁全塌，底座尚存有四柱痕迹。东侧有门通往中室，南北两侧有门通往右后室和左后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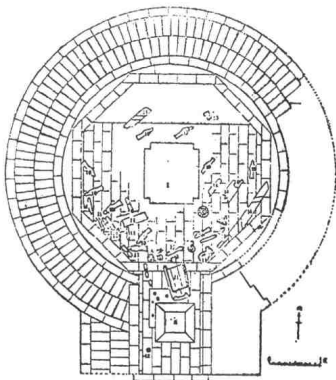
左后室 直径1.92米。保存完整，周壁砌四柱。南侧有门通往后室。在室内东西两侧各置铜钱一堆，还有木箱的痕迹，可能原为钱库（图三、四）。

右后室 直径1.88米。墓壁已坍塌，四个柱基尚存。北侧有门通往后室。铺地砖上遗有绿色霉烂的有机物

一层，可能是腐烂的粮食。



图五 马直温墓位置示意图



图六 马直温墓平面图

1. 祭台 2. 影青瓷托盏 3. 定窑白瓷小碟 4. 白瓷折腹小碟
5. 辽白瓷小碗 6. 铜钱 7. 石经幢顶 8. 石经幢身残片 9.
墓志 10. 十二辰木俑 11. 木偶人 12. 楠木小枰 13. 柏木
榻残件栏板 14. 柏木墓靴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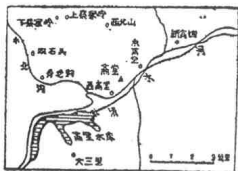
(二)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

1979年10月,北京市大兴县京开公路西红门段东侧液压机厂基建工程中,发现残砖室墓一座。

墓室结构

墓葬早经盗掘,扰乱严重。圆形墓室,系用 $37 \times 16 \times 5$ 厘米的灰条砖砌成,墓壁按两丁两顺四重砖排砌,壁厚1.10米。墓顶已塌,东壁已被破坏无存,西、南、北侧最高残存十层砖,高约1.06米。墓室直径4.10米。墓室南壁正中有甬道,宽约1.21米,甬道为券顶,也已塌陷,南端残存封门砖三层,外接墓道(墓道因工程关系未作发掘)。据塌陷的墓顶残迹,原系叠涩内收的穹窿顶,高度已无法确定。墓室底铺地砖,北端尚留一段地面未铺砖,估计为放置木榻的位置。沿圆形墓壁还用单砖铺成一周呈八角形的砖阶,砖阶上残存木质地袱,地袱上有凹槽、榫卯。据墓壁不抹灰的现象及木质地袱的存在,推测墓内当有墓帐的设施。墓室正中

有砖砌四角方形祭台一座,宽1.41、长1.21、高



图七 墓群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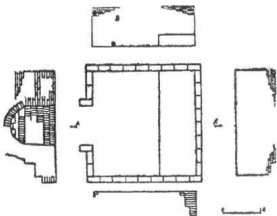
0.40米,表面抹白灰,残存黑红色彩绘痕迹。墓底距地表3.78米,积淤泥约30厘米。

(三)北京市高堂辽壁画墓

高堂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河畔,距北京市约九十里。1979年8月17日,高堂公社西高堂大队群众,在村东俗称东坟一带挖土时,发现一座古代壁画墓(图七)。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和门头沟区文化办公室立即组成发掘小组,进行发掘,9月中旬结束工作。

墓室结构

为砖砌单室墓,墓顶距地表0.92米,墓门向南偏西15度。由墓室、墓门、墓道组成。墓室,自墓底向上至1.2米处,四壁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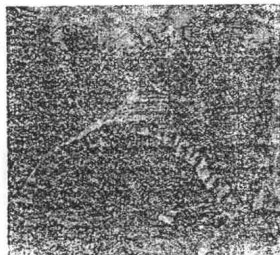


图八 墓室基底平面及四壁下部剖面图

方形,由此更上,墓壁砖逐渐向上斜收,券成穹窿顶。南北长、东西宽各2.8、高2.6米(图八)。墓壁用长35、宽15.5、厚5厘米的单面青灰色砖错缝平砌,叠缝处用石灰黏接,十分坚固。墓内在砖壁上抹1厘米厚的白灰面,打抹光滑,然后在上绘制彩色壁画。



图九 奇堂辽墓外壁



图十 奇堂辽墓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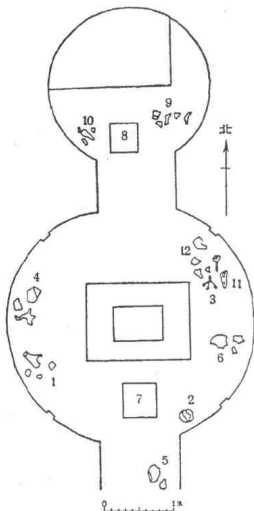
墓室内北部砌长方形平面棺床，长2.8、宽0.98、高0.15米。棺床及基底均用砖横铺砌成。墓室南壁正中开设墓门，用单砖横铺砌成，顶作拱形。门高1.2、宽1.05、门洞壁厚0.4米，壁上抹1厘米厚白灰，在东西洞壁白灰面上各有墨写楷字。墓门外端仅留有一层不完整的封门砖。此墓早期被盗。外接斜坡墓道，为后来残墓扰乱。

(四)西郊百万庄辽墓

1958年4月，在西郊百万庄发现砖室辽墓两座，皆被盗掘过。一为圆形，有前后两室(1号墓)；一为八角形单室(2号墓)。1号墓被破坏了一少部分(原墓顶已塌陷)。根据当地居民谈，在这两座墓葬的北面，耕地或取土时，经常发现圆形的砖券，估计可能是古墓葬区，这些情况有待进一步钻探才能证实。

墓室结构

(1)1号墓 墓室全部用沟纹砖砌成，墓壁用长方形的，砖长36、宽16、厚6厘米；铺地砖是正方形的，38厘米见方。斗拱及门窗部分，是用特制砖和磨砖镶在墓壁上的。墓葬前、后二室，二室之间有甬道。顶部全部坍塌，由残存的痕迹可以推测原来是穹窿式顶。前室直径3.52米，南北各开一门，南门为墓室正门，北门通往后室。墓道为斜坡形，宽1.11、长3.6米，斜坡向上倾斜18度(图十一)。墓门正南向，用砖砌成拱券，高1.83米，门框为正方形，上部有雕砖门簪两块，两侧绘牡丹花彩画。拱券东西两壁绘有人物像。墓室墙壁砌法，下部为两铺一立(一丁二顺)，上部是交错平铺(顺砌)。在墓壁内，按圆周四等份，用红彩影作立柱四个，上设雕砖斗拱。东西两壁有直棂窗两处。墓壁



图十一 1号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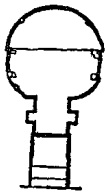
1. 三节陶罐 2. 铁灯碗 3. 铁三足灯架 4. 5. 9. 10. 瓷片 6. 残木盒 7. 8. 墓志 11. 铁锁 12. 陶片

四周涂抹白灰,分绘壁画。此外门、窗、斗拱、立柱均用黑、红二彩粉刷。后门拱券砌法与墓门相同,甬道长0.75米,室内中央设一棺床,高0.5、长1.5、宽1.07米,上置木制骨灰盒一个,已腐朽。棺木东西两侧,分设随葬品。后室直径长1.8米,墓室结构大致与前室相同,但是约三分之二的面积,被近代建筑基础所破坏,壁画全部脱落,随葬品全被扰乱,在淤土中尚保留很多火烧过的残尸骨。

(2)2号墓也是用沟纹砖砌成(长方砖与方砖尺寸与1号墓相同),平面作八角形,每边长1.6米。墓门正南向,顶部及墓壁大部分塌毁,无法辨认其原貌。墓道已被破坏,墓室的壁面仅保留残缺不全的下半部,亦无法分辨其内容。室内中央设一长方形砖槽,内置火葬骨灰,所保留的很少的随葬品已扰乱。

(五)西翠路辽墓

墓在西郊沙沟村准备修建的西翠路路底。这个地区在日伪时期修建过一条石子马路,因载重汽车往来甚繁,所以墓顶早已坍塌;日本投降后,农民又在此地铺了40厘米的沙土,进行耕种;直到1953年7月,市卫生工程局修下水道时该墓才被发现。经过清理,发现此墓早期曾被盗,壁画也被部分破坏,随葬器物很少。对墓内壁画作了临摹,全部墓室作了模型。



图十二
西翠路辽墓示意图

墓室结构

墓正南向,墓室为圆形起券,用绳纹砖砌成;这种绳纹砖是北京唐、辽墓葬所常见的。砖长37、宽18、厚6.5厘米。砌法为两铺一立。墓室完全仿大木结构,墓长7.65米,最宽处5.04米。门外墓道长2.85米,墓底距现在地面3.5米,坡度极陡,南高北低,甬道长1.38米左右,两壁有对称的圭形壁龛,龛高90、宽34厘米。墓室四角各有柱头,柱头上有“把头纹项造”的斗拱。除西北角斗拱保存完整外,其余残破不堪。拱上绘有彩画,其体裁类似牡丹花,彩色非常鲜艳。东西立壁设有假山各一座。门上有八个一排的门钉,共二排。北面的墙壁全是彩绘壁画,因坍塌漫漶过甚,只能看出一部分内容。壁画上绘有类似圆形鼓凳一个,还有荷花、水鸟、小鹅等写生图画。

(六)洪茂沟辽墓

洪茂沟在北京西郊月坛北约一里,是在1957年10月28日,市房管局在建筑挖槽时发现的,当时工地负责人因误认为枯井将部分墓砖取出。挖到底部发现墓志,方和我们联系,我们去现场时墓葬已大部破坏,只保留部分墓壁。在壁上留有长80、宽50厘米雕砖七菱窗,残存的壁画已模糊不清,墓底紊乱不堪,推测是被盗过的。

墓室结构

墓葬为圆形,据残存墓壁弧度计算,墓室直径约2.5米,墓葬为砖室墓,用沟纹砖砌成,砌法为两铺一立;墓壁高1.8米,甬道和墓门已无存,该地为现代回民墓葬区,因此墓顶无法保存。墓志置于尸床之上,尸床高50、长105、宽80厘米。

(七)彭庄1号辽墓

彭庄位于永定门西城墙豁口外西南一里。全村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土质为含沙黄土,清代曾在此开设砖窑厂,取土后的坑洼地带已被炉灰填平。清末又成为义地。1号墓在墓群的中央,东距7号墓约500米,向西90米处为第2号墓,向南150米为6号墓和4号墓,5号墓,向北25米为3号墓。总的来说,它的位置是在新建成的铁路北面站台中央,当修建站台打地基取土时离地面50厘米露出墓壁,顶部早已破坏,墓门也已坍塌,壁画模糊不清仅保留极少部分,室内为乱砖填满。

墓室结构

墓室为圆形,直径6.25米,立壁残高1.9米,正南部有缺口直通甬道,长1.5、宽1.45、残高1.9米,墓门正南向已塌陷,无法复原。墓壁皆用白地朱、黑色绘成各种壁画,但因年久水浸,已模糊不清。曾部分临摹以备研究。墓壁东侧镶有雕砖桌子一具、椅子两把,墓壁北侧中央砌有尸床一座,高1.16、宽0.85、长0.8米。四周皆用朱色绘成龛门,墓葬全部用灰色沟纹砖砌成,砌法是两铺一立。墓底平铺灰砖。

(八)彭庄2号辽墓

墓距离一号墓90米。墓顶及壁全部被破坏;上部为重叠的近代墓葬所打破,墓的北侧为近代墓葬所打破;东侧有1.3米厚红烧土层可能为窑址;南侧全为近代垃圾所扰乱,墓门及甬道坍塌不堪,无法恢复其原状;东侧保留尚完整,但壁画已模糊不清。

墓室结构

墓室为抹角长方形，用沟纹砖砌成，砌法是两铺一立，长3、宽2.5米。墓壁残高1.3米，墓门正南向。墓室北侧有一尸床，长1.3、宽1、高0.6米，基底亦用沟纹砖铺成（这种沟纹砖为北京辽墓中常见的），砖的一面有六道长沟纹（这种沟纹对于加固建筑物起了很大的作用）。

(九) 彭庄 3、4、5、6、7 号辽墓

3号墓葬是在1956年7月发现的，北京铁路管理局施工前，曾有人在此挖黄土，掘出瓷器7件，报当地人民政府。1957年工地开工后，此墓才被清理。墓底离现在地面2.7米，顶、壁、门及甬道全被毁掉，只保留三分之二的底部。直径约2.8米，建筑所用之砖与2号墓相同，至于结构和砌法无法得知。

4、5、6、7号四个墓葬全部破坏，只残余部分底部，墓葬的底形与1号墓相同，皆为圆形，4号和6号墓直径约2.6米。5号为2.7米，7号为2.85米。各墓中皆无随葬品，可能是破坏及被盗之故，在此不加详述。

(十) 丰台镇桥南辽墓

1970年3月，北京丰台区丰台镇桥南，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座辽代重熙廿二年（公元1053年）的墓葬，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进行了清理。

墓室结构

此墓为圆形砖券墓，方向南北，券顶已塌落，仅存墓壁，高约1.2米。墓砖灰色，一面为六道深沟纹。墓壁砌法为一铺一立，壁用白灰涂抹，原绘有壁画，因脱落严重，已看不出所绘内容。墓门设在南面，宽约1.3米，用砖封堵，外为甬道，长1米，甬道东壁上有一小龛，顶部用三层砖收编砌成，龛高0.96、宽0.50、深0.20米。墓底直径约3米，铺有厚0.50—0.50米的木炭，在墓底的边缘有残存的柏木条，墓底靠北部有一用方砖砌成的长1.90、宽0.90、高0.50米的棺床。未发现完整骨架，只有残骨出现。墓的东壁有影作的桌、椅。桌宽高相等，约0.46米，椅宽0.40、高0.70米。

(十一) 西城区阜成门外辽墓

1970年3月，西城区阜成门外发现一座辽保静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董崖及其妻张氏的合葬

墓。

墓室结构

因该墓坍塌严重，未作清理，只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清河县君墓志铭”（董崖妻），及董崖的“灭罪真言”刻石各一块。

(十二) 西城区府右街辽墓

1970年3月和7月，分别在西城区府右街罗贤胡同和西椅子胡同发现了二座辽代墓葬。

墓室结构

这两座墓都是圆形券顶砖室墓，墓壁上部有仿木结构的一斗三升斗拱，并设有假门和桌椅，因该墓葬皆破坏严重，未作正式清理。

(十三) 西城区锦什坊街辽墓

1971年10月，在该地区距地表7米处发现。

墓室结构

该墓为抹角长方形砖室墓，因坍塌破坏严重，未作正式清理。

(十四) 西城区桦皮厂辽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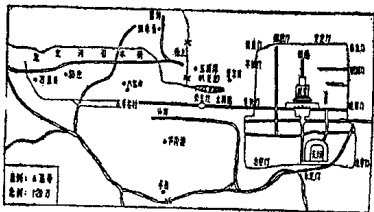
1969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本市基建工程中，于北京新街口豁口以西桦皮厂，明代城基下发现辽重熙二十二年（公元1053年）张俭墓志一方。

墓室结构

该墓处于明城墙之下，推测在明代修建城墙时将此墓全部破坏，因此，该墓葬结构的形制无法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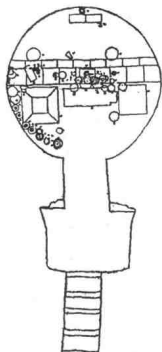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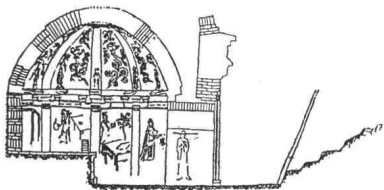
(十五) 北京西郊辽壁画墓

1981年6月6日，北京八宝山殡葬管理所于该所院内东侧施工，发现一座砖室墓，当即通知我队。我队从7日开始发掘，22日结束，清理出辽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壁画墓一座。墓主人为韩



图十三 辽壁画墓位置示意图

伏，此砖室墓保存完整，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图十



图十四 江甯画墓平、剖面图(比例 1:100)

1. 荷花式白瓷小碗 2.3. 铜罍 4. 青瓷碗 5.41.42.43. 青瓷盘 6. 青瓷水注
7. 青瓷盏托 9.13.27.30.36. 白瓷盖罐
10. 青瓷碗 11. 荷花式白瓷小碗
- 12.26. 葵瓣式白瓷碗 14.15.18.38. 漆盘痕迹 16. 木桌痕迹 17. 陶砚 18. 墓志 20. 陶盆 21. 白瓷渣斗 22.37. 鸡腿瓶 23. 银钗 24. 铁棺钉 25. 长方漆盒痕迹 28.29. 柳斗式白瓷钵 31. 轴陶罐 32.33. 器盖 34. 铜镜 35. 铁饰架
39. 白瓷小碗 43.44. 陶火圈 45. 陶执壶 46.52. 陶三足炉 47.48. 釜 49. 陶罐 50. 陶研磨钵 51.57. 陶勺 53.54.55. 陶罐 56. 陶盆 58. 铜钱

我们探出其长为 6.9 米。据此可知墓道总长为 9.8 米。在墓道与墓门连接处的东西两侧，各留土台一个。

(2)墓门南向，为仿木建筑结构。门，券顶，高 1.52、宽 0.92 米，全部用磨砖砌成。墓门用砖封堵，封砖砌成人字形。从底至屋脊通高 3.5 米。其正面结构情况是：屋脊最上层用立砖砌成，下砌平砖四层。四层平砖的最下层，略向内收。屋顶是用板瓦砖铺砌而成，瓦当并非单独镶配，而是在板瓦

状的砖前端雕刻而成。下以砖制檐椽托垫，再下有单抄单下昂五铺作斗拱三朵，继下为栏额、门框、门簪等，也用磨砖砌成，抹角起线。整个墓门均以白彩作底，以黑彩勾出门框、椽檐以下各部件全部涂朱，斗拱、枋、柱用黑彩勾出轮廓，拱眼用墨勾画花卉，可惜都已漫漶，不易辨清(图十五)。

(3)甬道墓门至墓室间尚有长 1、南宽 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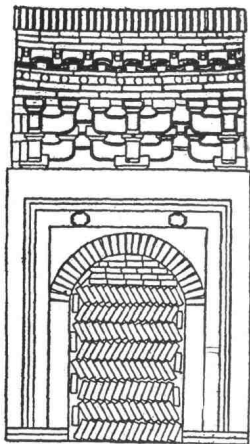
三)。

1. 墓形制

墓以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方向 7°(图十四)。

现分别介绍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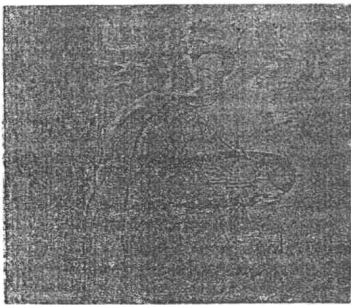
(1)墓道因施工紧迫，未能全部清出，只清理出墓道后段至墓门处一段，共长 2.9 米。具体情况是：紧接墓门长 1.3 米的一段墓道呈平底，宽 1.73 米。由此向南的一段墓道呈阶梯式，只清理了四级，每级宽高均为 0.4 米。这段墓道长 1.6 米，宽 0.7 米。从这段再往南的墓道，



图十五 墓门之立面图

北宽0.88、高1.52米的一段甬道。甬道向南微呈喇叭状。甬道东西两壁以砖砌成，外抹一薄层白灰，其上绘壁画，因剥落太甚，只能隐约辨认出，似东西壁各绘一官吏，头戴展角幞头，身着束带红袍，脚踏皂靴，面向北侧，拱手端立。甬道顶为砖砌单层券顶。

(4)墓室全部用长32、宽17、厚5厘米的青灰色单面绳纹砖砌成，单室穹窿顶，平面呈圆形，通高3.45、直径3.18米。墓室门南向，券顶，宽0.88米，高与墓门同，也用绳纹砖砌成人字形封堵。墓室门与墓门以甬道连通。墓室周壁用两卧一立法砌砖八层，共高1.82米。墓室穹窿顶是从墓壁1.82米处向上开始起券，先砌横砖十三层，再砌竖砖十一层，直至顶部。壁与顶起券处，还加砌砖雕莲瓣影作十二个。墓室周壁及穹窿顶均以白灰抹平压光，并绘彩画。



图十六 辽赵德钧墓右前室西侧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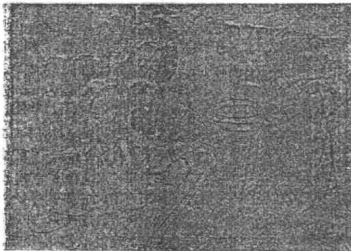
二、墓室壁画

北京地区辽代砖室墓中很多绘有壁画，其内容都是有关墓室主人生前享乐图以及表现当时建筑结构法式，有的墓葬描绘比较细腻，这对中国绘画是珍贵的资料，现将有绘画的砖室墓分述如下：

(一)赵德钧墓壁画

九座墓室皆施彩绘，墙壁上镶有壁画，但大部剥落，完整者仅存三幅，一为墓室主人生前享乐图，画中共绘九人，左三人着红袍，戴展角幞头，其中二人有短须，脸部肥胖，三人正在欣赏一幅画，画的内容可看出有类似凤凰的形象。估计这三人中可能包括墓主人在内。右面六人为童仆，三人戴冠，其中一人手持宝剑，另三人梳髻，一人叉手于胸前。

根据这幅享乐图分析画意，左三人中之高大者很可能是墓室主人赵德钧，因为当时绘制壁画的人必参考墓室主人赵德钧生前的肖像，而将其加以突出。即使墓主人的肖像未能保留，绘制者也必



图十七 辽赵德钧墓右前室东侧壁画



图十八 辽赵德钧墓左中室东侧壁画摹本

然按赵德钧家属要求而着意绘制。以此推论，所绘制墓室主人肖像不会与其本人有甚大差异。这幅享乐图是研究中国辽代时期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

其余两幅壁画，东侧壁画绘一女仆坐在案前，案旁还有一水盆。女仆梳高发髻，体态较胖，两袖卷起，正在用手揉面，姿态非常生动自然。西侧的一幅也绘一女仆，梳高发髻，上绕一环形饰物，着方领长衫。手托一圆盘，作行走状，盘底绘有山水画，盘上置面食两个。

壁画中所见女仆发髻的样式、服饰的特征皆为唐风。这两幅壁画也是墓室主人生前享乐图之一。

(二) 高堂辽墓壁画

壁画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壁画分布于墓室四壁和顶部，颜色富丽，刻画精细，装饰华美，充分反映了辽代民间画师的创作才能和绘画技巧。虽距今有八百多年，色彩仍很鲜艳。

(1) 墓门内沿，用墨勾勒出券形墓门轮廓，内涂紫红色，上墨绘勾连纹图案。门洞西壁白灰面上用墨写楷书“安堂”“斋”三字，东壁白灰面上用墨写楷书“乐堂”二字，字为14厘米见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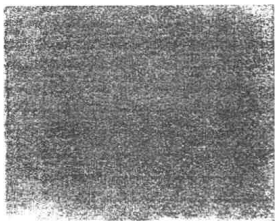
(2) 墓门内西侧，彩绘两侍女。前者稍高，面带微笑，双手藏袖内托盘，盘内盛石榴、鲜桃、西瓜。后者稍矮，紧跟在前者之后，双手托盘，盘上置一高足碗。前者身高67、腰宽13厘米，发梳高髻，戴云凤冠，饰有耳环，项上戴金瓔珞圈，身穿绿色宽袖袄，内衬粉色长袖衣，白色帔巾飘垂身前，下曳红色长裙，裙带下垂。后者身高56、腰宽12厘米，服饰与前者相同。



图十九
高堂辽墓前档上所绘侍男

(3) 墓门内东侧，彩绘两侍女，与西侧相对称。前者面部残损，后者上身残缺，只剩下下部。衣着与西侧的大同小异。

(4) 西壁彩绘故事画，用四株不同树木将画面分成左中右三个部分。右边一段：绘有一祠龛，内正面袖手端坐一塑像，桌上供有祭品。前有一人，头戴幞头，身穿



图二十 高堂辽墓彩绘前档残稿

红色宽袖长袍，腰间有黄色带，躬身拱手，作行礼状。左有年轻妇女二人，一身穿粉色宽袖上衣，绿帔肩，下着灰色长裙，袖手而立；一身穿红色斜领宽袖长袍，左手作指龛状。表明礼祭先人场面。中间一段：绘一军官，身着铠甲，足着长靴，端坐石上，右手执剑，怒目喝令。身后立侍从两人，一人头戴圆沿红纓帽，身穿戎装，缠裹腿，双手举剑稍。另



图二十一 高堂辽墓墓门内西侧彩绘两侍女